

唐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的发展及影响

□ 山东万杰医学院中文教研室 李振松

摘要 随着多元文化的碰撞,唐代私学在规模和形式上也相应地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将对多元文化影响背景下唐代私人授学的发展以及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希望对广大研究者提供有益的文献参考。

关键词 唐代 江南私学 发展 影响

安史之乱后,江南私学得到了相对优越的发展,众多中原优秀人士的涌入,使得江南随处可以见到私学的踪迹。江南学子陆淳在中原儒学大师啖助的教导下,认真地对《春秋》进行钻研,每有疑惑,鹤发童颜的啖助便不厌其烦地对他传道、解惑,师徒之间其乐融融,长期生活在中原的元稹,因为偶然的原因路过了江南越州的一个小村庄,感慨于村中稚童在私塾老师的教导下,开始学习自己好友白居易的诗词歌赋^①,佛寺除了每日要招待信徒香客外,还会引来诸多学子寄居学习,风景如画的江南秀美山林之间,活跃着以李嘉佑、邱为为代表的一大批隐居之人醉心于文化修习,在文人名士的家中,家学的兴盛不仅仅体现在父亲对后代教育上,母亲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多元文化影响下唐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繁荣。

一、多元文化影响背景下唐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的发展情况

有唐一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有了更加大规模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授课方式多样化,包括私人授学、开展私塾教育、隐居习业、在家中学习四种方式。无论是急于求取功名,还是以修身养性为目的的文人雅士们,均有意识地进行私学方式的不同选择,进行自己的文化修养学习。

1.私人授学的发展。唐朝著名儒学家、经学家啖助,其人学识渊博,在儒家经典上的造诣更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唐玄宗天宝末年,啖助因种种原因而搬家到了江东,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江南地区,本打算落叶归根在晚年回到北方。无奈天不遂人愿,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打破了开元盛世的美梦,啖助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关东。在江东,他凭借着出色的文学造诣进入官场,先后担任台州临海县尉、润州丹阳主簿。卸职以后定居丹阳。他在生活上继承先儒安贫乐道的价值取向,即使穷居陋巷、三餐简陋,依然能够潜心研究《春秋》。在其专注于名著解读的同时,啖助早期收下的徒弟陆淳一直追随其左右,不断进行理论知识学习。据陆淳自己回忆,他拜啖助为师,“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十有一年”。还称赞啖助老师在对其进行文化教育时,常常循序善诱、见解独到,“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旨,颇得而闻。”啖助因病逝世后,其著作《春秋集传集注》以及《统例》的遗稿,陆淳将它们逐一整理出来,为《春秋》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这是江南私人授学的一个典型。

私人授学是江南私学普及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专门设置有固定的课堂进行大规模的专人负责具体科目的教学方式。私人教学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开小灶学习”类似,指的是学业有成、知识涵养足够以及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文豪,对入门弟子进行私下指导的方式。进行私学教学的人员不一定非要局限在文化界,官场上满腹经纶的在职人员也可以对慕名求教的学子进行指导。

2.私塾教育的开展。私塾和今天所说的“聘请家教”很像,都指的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通过出资邀请教师对本家的孩子进行知识理论普及教育^②。唐朝私塾十分普及,早在中唐时期,家境一般的父母便会邀请教师对孩子开展私塾教育了。有过著名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幼年时就曾因为家境穷困,没钱进入正规学校上学,看到邻居家小孩儿却有着父亲、兄长为自己开的专门学校而羡慕不已。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也曾邀请写过《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张籍为自己的儿子韩昶进行诗书教学。私塾教育在江南的流行程度更是普遍,元稹在其作品《白氏长庆集》中曾经介绍道,自己在越州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十几个学生在学校集中在一起学习诗歌创作,元稹便问这些孩子,你们学的什么诗啊?学生回答:“我们在学先生教的白乐天的诗集。”杨收出自书香门第,长期客居苏州,《旧唐书》曾记载杨收的父亲杨遵直在苏州维持生计的谋生办法便是靠着讲学,通过为别人家孩子进行讲学而谋生。

唐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便是以寺庙为单位所出现的寺学,佛寺提供的这种相对特殊的授课方式,并不代表在寺庙中学习就要进行佛经的深刻研读,进入寺庙学习的人,其使用教材和一般学生采用的普通教材并没有不同,佛寺为这些普通甚至是寒门子弟提供教材、学习场所以及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基本保障,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能够实现佛家“普度众生”的最高理想,也能够凭借这一善举获得更多的信徒。在江南地区,无锡的惠山寺、池州的九华山寺便是其中的代表。有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大量体恤民间疾苦的悯农诗人李绅,早期便因为家境穷困而先后进入惠山寺会稽以及剡川佛寺学习,李绅本人也在《上家山》诗序中回忆道:“常于惠山肄业。”寺院进行私塾学习往往会出现知名人士到来,而慕名学习人数骤涨的“名人效应”,举例说明,著名僧人灵一在会稽若耶溪云门寺居住期间,众多学子奔走相告,一时间云门寺人满为患。

3.隐居山林进行学习。具有悲天悯人情怀同时感叹时运不济的学子在山林间进行文学知识学习也属于私学的一种,这种学习方式的流行,直接原因便是安史之乱对于盛唐统治的冲击^③。士人隐居学习的地方通常为环境优美的山林之地。在江南更是如此,白居易早期对江南风景的大力推崇,使得江南在学子心中成为心灵的安息之所,“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等众多佳句将江南描绘成一个神秘而美好的伊甸园,学子在隐居山林修业时,通常会选择会稽、四明山、九华山等人文情怀与自然风景绚丽的地方。举例说明,《唐才子传》就曾经记载嘉兴诗人邱为,由于考试没有成功,便归隐山林进行学术研究,这一归隐居

论佛教影响下形成的两大画体：晋唐体与宋元体

□ 河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孙利波 刘媛妹

摘要 本文将从新的视角将中国画分为两大绘画体系,即“晋唐体”和“宋元体”。而这两种画体的形成及其发展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一个是佛法,一个是禅宗。文章将深入地探讨它们演进和分野的原因。

关键词 中国画 画体 佛教 晋唐体 宋元

纵观中国绘画史,笔者将中国画分为两大体系,并冠名其为“晋唐体”和“宋元体”。本文就从这两种画体的孕育、形成及其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它们出现和分野的原因。首先,这两种绘画体出现的先后顺序就像它们本身的名称一样显而易见,即,晋唐体先于宋元体,同时这种分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两种画体形成的大致时期。那么它们分别是怎样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呢?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它们受到哪些宗教的影响,又反映了哪些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特征呢?

一、说教明鬼的时代——“晋唐体”之孕育期

晋唐体绘画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晋唐体人物画也是在这个时代率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正处在原始宗教土崩瓦解的时期,宗教内部的疑天思潮致使古代宗教丧失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格局被打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活跃期,即被称作“百家争鸣”。这个新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哲学、新思想,但是源于中国原始宗教的鬼神情节依然存在。其中,孔子,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鲁国,周礼缔造者周公的封地,重周礼的礼仪之邦。这种文化影响了圣人孔子。所以儒家继承了周代重人文的精神,同时儒家也对鬼神持有含蓄不言的观

然长达数年,齐抗本是唐朝的当朝大员,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职,唐德宗时更是官拜中书侍郎,然而由于安史之乱,齐抗避难于越州,选择剡中隐居读书。李嘉佑在会稽山寺读书,李嘉佑在给朋友的诗文中曾经写道:“山阶闲听法,竹径独看书”,对朋友的隐居学习十分赞赏。

4.家中学习。家学是一个家族保持自身门第优势的重要方法,随着科举考试成为官员选拔重要依据的普及开来以及豪门势力被统治者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世家大族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也就相应地提高了。而在普通阶层,通过读书实现家门跻身于上流社会也已经成为寒门子弟普遍接受的选择。由于在家庭中进行学习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以及长期性,同时还具备最大限度上阻止外来因素影响等优点,某一门第的家学文化一旦产生,便通常会被长久地传递下来。在江南地区私人授学的发展过程中,家中学习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方式。史料记载,权皋认为其子权德舆天赋极高,便在家中经常对孩子进行早期知识的教育,权德舆的表现也没有辜负其父亲的一片苦心,三岁的时候就知道“变四声”,到了四岁,就能够作诗了。

二、多元文化影响背景下唐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影响

随着江南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上升,江南私人授学也得到了更加多样化的发展,这又反过来对江南总体实力的上升起到了十分必要的文化补充,为江南大规模地出现多方面人才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保证以及智力基础。不仅如此,私人授学的发展也为女性重要角色的凸显创造了必要的平台,史料记载,山阴县孔少

点。而高举“明鬼”旗帜的墨子也在不断地责难儒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神论断。同时,源于荆楚之地的道家本身就诞生于远离周公的巫文化,从而形成了荆楚重玄奥,周土重人伦的区别。《庄子·逍遥游》有载:“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人伦与神鬼思想的影响下,这时期的绘画主要呈现出成教化的说理性和一些神鬼题材。比如相传孔子参观周代的明堂,见到壁画有尧舜禹之容,桀纣之貌,且各有善恶之状,再如出土于长沙楚墓的《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就是对这两种思想的表达。我们从这两幅战国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到运用组织线条的特点,但此时的绘画依然呈现出纯装饰之特点,其中线的独立性与表现性并未被特别重视。两汉继前代是中国绘画的一个发展变革期,这一时期为后来的晋唐体绘画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和技法经验。中华大地经过春秋战国的纷争和楚汉争霸,在汉代又迎来了国家的伟大统一,政治上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方面汉代建立后继承了秦代和先秦的宗教祭祀,又有增益。故此,汉代鬼神巫术蔚然成风,特别是仙道思想十分流行;另一方面异国佛风开始东渐。另一方面,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的激励推

安与兄长孔邵新都凭借着出色的文辞而被世人认可,在高祖时官至内史舍人,他的孙子孔若思,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又偏逢父亲去世,母亲褚氏便自己担负起了对孩子的教育职责,通过对孩子进行《四书》、《五经》以及相关学术文献的教导,孔若思终于一举及第,最后更是达到了吏部侍郎的官职。出生于无锡的李绅,六岁时父亲早逝,他的母亲卢氏对其进行相关经义教导,家中生活贫寒,但在学习上却丝毫没有一点将就,最终在元和元年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女性的参与是唐朝后期私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产物,对于提升女性在教育中的总体地位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是值得广大研究者深入讨论的重要现象。

唐朝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我国江南地区的民族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量中原人士的涌入为江南地区的私学发展提供了十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证与学术文献的参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代江南地区私人授学在形式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私人授学、开展私塾教育、隐居习业、在家中学习四种方式的出现,尤其是寺庙授学与女性承担对家庭成员的教育职责,不仅是唐代地区私人授学的一大特色,更为教育的普及化、平等化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江南地区总体文化实力的创建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张超.唐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10.
- [2]张一平.唐代官学教育向私相授学的分流[A].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C],2009.
- [3]严春华.从碑志文看中唐时期的私学与家学[A].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C],2009.